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0.06.003

中国乡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及农民收入效应研究

涂 丽

(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205)

摘要:信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信任危机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数据转码方式构建实证模型检验乡村社会的信任格局,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信任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农民对亲戚和邻居的信任程度最高,对陌生人最不信任,农民对不同人群之间的信任程度与亲疏远近关系呈现明显的“差序格局”。同时,农民的信任程度能够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其中普遍信任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产生明显的收入增长效应,该效应在市场交易频繁的地区作用更大。

关键词:乡村社会;信任;差序格局;收入效应;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0)06-0042-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到市场经济形势下“半熟人社会”的巨大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经济呈现突破式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生发于乡土社会的传统规则逐渐失效,而新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乡村社会因此陷入一种缺乏规则的社会失序状态^[1]。有研究指出,农村商品化改变了农民的合作方式和行动规则,直接造成乡村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要素大量流失,导致乡村陷入集体行动困境^[2]。乡村社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变化急剧,由此引发的农民信任危机和乡村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

信任代表个体对其他行动者的一种积极性预期^[3],研究认为信任主要源自人们长期的社会互动与重复交往^[4]。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会因为人际关系和交往频率而存在强弱差别,即人们会因为亲疏远近关系而对他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5]。信任又是嵌入社会制度中的一种功能化机制,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存在明确的互动关联,当社会结构发生变迁和转型时,社会信任也会随之变化。中国乡村社会的信任问题历来受到较多关注,基于中国乡土独特的社会结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的信任主要表现为以血缘和家族网络为依靠的特殊信任,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则普遍缺乏信任。虽然学术界对中国人的信任是否仅局限于家族网络之中仍抱有疑虑^[6-7],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认同中国人在家族和血缘关系内部的信任程度更高,从整体上看中国乡村地区的信任依然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取向型信任^[8-9]。随着乡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农民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不再局限于家族和村庄之内,由此导致农民的信任格局呈现新的面貌。黄家亮(2012)指出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已经随着传统乡村的急

收稿日期:2020-07-05

作者简介:涂丽(1990-),女,湖南张家界人,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区社会治理。

剧转型而走向失调,传统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新的乡村信任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9]。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任通过缓解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契约的阻碍,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合作行为,以实现相互有利的经济交换,成为实现经济交换和收入增长的润滑剂^[10]。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指出社会信任对人均GDP、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速度和外资引进等经济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4]。唐为和陆云航(2011)认为社会信任要素对农民的收入水平等经济发展指标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要素不同,社会信任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对经济发展产生补充效应,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11]。Dincer和Uslaner(2010)使用美国1990—2000年的数据分析指出信任与人均收入增长率等经济发展指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12]。Algan和Cahuc(2013)基于106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社会信任数据,发现更高信任水平的国家有更高的收入水平,社会普遍信任的差异可以解释五分之一的人均收入差异^[13]。齐春宇等(2018)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信任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人均收入等经济增长指标产生正向影响^[14]。吕朝凤等(2019)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在不完全的市场契约环境下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效应^[15]。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信任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之后影响一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2]。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乡村传统的信任格局和社会秩序发生重大转变。现有文献对市场经济环境下乡村社会信任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数采用描述统计或个案介绍,缺乏进一步的统计验证,对乡村社会信任的收入效应的相关研究更为少见。当前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依然是乡村治理的首要任务,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问题也不可忽视。在乡村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以信任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何种格局和状态?不同类型的信任水平对于乡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怎样的关联和影响?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结合实证数据深入分析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社会信任格局,探讨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信任问题,同时对乡村社会信任产生的农民收入效应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信任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乡村社会秩序重构与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升提供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乡村社会信任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与西方社会中界限清晰的团体格局不同,呈现出以己为中心不断向外延伸和衰弱的同心圆波纹状形态,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都具有这种水波纹格局。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将中国的社会关系描述成一个因血缘、地缘的纽带联系相互叠加,最终呈现出以个体为中心且具有亲疏远近差别的社交圈子^[16]。

信任是施信者基于现有信息量或个人经历而对他人做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存在于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及以上结构系统中。当个体对他者的信息更加了解时,更能够准确识别他者是否与自己拥有相同的规则符号或共同利益,从而对他者保持信任。个体对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他者之间的信息更加对称与透明,更容易获得他者的相关信息,从而对其保持信任。马克斯·韦伯(1951)认为信任包括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类型,他指出中国社会中人们总是与具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他者保持较好的关系强度和较高的信任度,

而对与自己关系较远的他者信任程度较低,造成中国主要以特殊信任为主而缺乏普遍信任。这种根据信任差异的类型化划分形成了中国社会信任的两极分化,即对自己群内或与自己具有亲密互动的亲属、邻居等熟悉的他者具有相对较高的信任度,而对那些自己不太熟悉、互动不多的群外人保持低度的信任。参照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与人际社会关系高度相关的社会信任也体现出“差序信任”的格局。人们对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也呈现出以个体为中心且随着关系远近和交往密疏而由内向外逐渐变弱的差序格局^[17]。结合“差序格局”基本概念,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信任类型的本质在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差序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乡村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不同的信任类型之间,更适用于分类更细的受信人群之间,且后者更能准确观测出信任的递进性变化特征。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提出中国乡村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假说。

假说1:乡村社会信任因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呈现由近到远的强弱差异,整体上乡村社会中特殊信任的强度要明显高于普遍信任。

(二)信任与农民收入效应

市场经济主要通过订立契约来规范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实现经济交易活动。现有研究一致认为信任能够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对区域内各项经济指标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交易成本的概念由科斯(1937)最初提出,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自愿交往和彼此合作的方式达成交易所支付的一系列成本,即人与人的关系成本。威廉姆森(198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认为社会中不同的交易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由于存在人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人们无法拟定出明晰所有成本的完全契约,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当前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契约多为不完全契约^[18]。基于信息量的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能够有效弥补市场交易中契约的不完全性,从而促进交易达成和经济增长。Granovetter(1985)首先将社会信任引入经济分析中,认为基于社会关系产生的信任普遍镶嵌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信任能够进一步防止欺诈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19]。如果交易双方相互信任,则能够有效减少因讨价还价而带来的交易成本,促成交易的达成和推动经济发展^[20]。在无法充分确定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属性的不完全契约条件下,信任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应^[15]。

农民增收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指标维度,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场域内的市场交易活动变得频繁。相较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完全依托特殊信任的互助换工的交易方式^[2],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快速模糊了村庄的社会边界,农民与家族亲戚等群体之外的个体或组织之间的交易活动迅速增加,并且发展成为农民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Arrow(1972)研究指出,信任可以缓解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契约的阻碍,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行为,实现有利的经济交换^[10]。在不完全契约的市场环境下,如果农民对他者的信任程度提高,便能够有效降低他们在制定契约过程中因讨价还价而产生的谈判和监督等交易成本,促成市场交易的达成,对乡村经济和农民增收产生积极效应。因此可以提出乡村社会信任的农民收入效应假说。

假说2:乡村社会信任对农民收入具有提升效应,在不完全契约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乡村社会信任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促进市场交易的达成,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采用系统层次抽样方法,从2003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横截面调查,是一种全国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2015年的调查数据中详细询问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情况,这成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在数据预处理中,根据样本类型筛选出农村居民样本,共计1896份。

本文根据CGSS数据中关于被访者对不同人群信任程度的题项测量乡村社会信任。CGSS问卷中共提供了被访者对亲戚、邻居、街坊、同村同姓人士、同村非同姓人士、同事、老同学、交情不深的朋友、外地相遇的同乡、一起参加文娱活动人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人士、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人士、陌生人等13类人群信任情况。在测量方式上,对被访者信任程度的测量采用五级李克特定序尺度,即被问到对某一类人群中可信任的人多不多时,提供给被访者的选项包括“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与不可信者参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等五个选项。表1显示了原始数据中被访者对各类人群信任情况的分布状态,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对亲戚、邻居等村庄内部人群以及同事和老同学等经常往来互动人群信任程度比较高,认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可信的,对那些交往不多的人群不具备较好的信任度,对陌生人的信任预期更低,认为大部分陌生人都是不可信的。描述统计结果初步证实了乡村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即农民对不同人群信任程度在描述结果中反映出一定的差异。

表1 乡村社会信任原始数据分布及其因子属性(单位:% ,N=1896)

受信人群	绝大多数不可信	多数不可信	可信与不可信参半	多数可信	绝大多数可信	信任类型
亲戚	0.32	3.16	12.24	43.35	40.93	特殊信任
邻居	1.11	5.01	13.92	54.01	25.95	
街坊	1.9	9.97	26.85	47.68	13.61	
同村同姓人士	1.05	7.49	25.58	50.74	15.14	
同村非同姓人士	2.11	11.08	32.28	43.46	11.08	
同事	1.11	8.91	34.81	42.77	12.39	
老同学	1.48	8.12	32.17	45.73	12.5	
交情不深的朋友	6.22	24.1	42.83	22.36	4.48	普遍信任
外地相遇的同乡	2.74	15.91	38.34	32.96	6.43	
一起参加文娱活动人士	2.74	20.83	46.15	25.05	5.22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人士	4.85	24.68	43.25	21.1	6.12	
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人士	2.95	22.36	42.09	26.48	6.12	
陌生人	39.61	33.86	18.46	6.49	1.58	

为进一步从统计上分析乡村社会信任的分布格局,本文借鉴了张荳芸和谭康荣(2005)以及邹宇春等(2012)的处理方法,采用多重等级评量方法对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即以问卷编码为基准,将受信人群从纵向的单个指标转变为横向的分类变量,原始问卷中各被访者受访人群信任程度则新生成一个反映信任情况的综合变量,从而使最终的分析单位从被访者转变为“被访者——受信人群”^{[21][5]}。最终呈现的数据结构为两个单独变量,即受信人群变量和信任程度变量。表2为转换后的数据转码示例,表中横向省略号代表13类受信人群类型,纵向省略号代表样本数量。转换后的分析案例总量为 $1896 \times 13 = 24648$,其中绝大多数不可信占5.25%,多数不可信占15.32%,可信与不可信参半占31.46%,大多数可信和绝大多数可信分别占35.55%和12.42%。实证模型中以转码后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以受信人群作为自变量,进一步检验信任的差序格局。由于信任程度是以五级李克特量表为测量方式的定序变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实证回归中经过删除缺失值处理后最终纳入计量模型的为1881份样本,共计 $1881 \times 13 = 24453$ 个案例总量。

表2 数据转码示例

样本编号	受信人群	信任程度
样本1	亲戚	4
样本1	邻居	3
样本1
样本1	陌生人	2
样本2	亲戚	5

表2 数据转码示例(续)

样本编号	受信人群	信任程度
样本2	邻居	4
样本2
样本2	陌生人	3
.	.	.
.	.	.
.	.	.
样本1896	亲戚	5
样本1896	邻居	5
样本1896
样本1896	陌生人	1

在分析乡村社会信任的收入效应时,为避免将所有受信人群信任程度统一纳入模型而造成多重共线问题,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将13类受信人群降维为两个信任因子。根据因子降维结果,对亲戚、邻居、街坊、同村同姓人士、同村非同姓人士、同事、老同学等7类人群信任情况命名为特殊信任因子,对交情不深的朋友、外地相遇的同乡、一起参加文娱活动人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人士、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人士、陌生人等6类人群信任情况则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表1中同时反映了不同受信人群的因子归属情况。对农民收入的测量采用被访者个体去年的实际货币收入值,表3所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平均年收入水平在1.47万元左右,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存在一定差异。实证检验中以农民年收入作为因变量,以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个信任因子作为主要自变量,分析乡村社会信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情况,回归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经过删除缺失值之后最终纳入回归模型的样本总量为1778。

结合相关结果和学术惯例,本文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了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就业状态、家庭人口规模和所属经济地带等作为控制变量。表3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或百分比	标准差	样本量
农民年收入(万元)	1.47	2.1	1793
性别			1896
男	50.32%		
女	49.68%		
年龄	49.87	16.54	1896
健康状况	3.54	1.31	1895
文化程度			1885
小学及以下	21.33%		
初中	33.37%		
高中/技校	41.11%		
大学及以上	4.39%		
婚姻状况			1896
已婚	80.49%		
单身	19.51%		
政治面貌			1896
中共党员	5.54%		
群众或其他	94.46%		
就业状态			1896
农业生产	65.45%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续)

变量	均值或百分比	标准差	样本量
非农就业	34.65%		
家庭人口规模	3	1.5	1893
所属经济地带			1896
东部地区	17.77%		
中部地区	48.63%		
西部地区	33.60%		

四、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研究设计,首先构建模型检验乡村社会信任在不同受信人群之间是否存在差序格局。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采用分步估计的方式逐渐加入变量进行实证估计(见表4),其中模型1a为控制变量模型,模型1b为在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加入受信人群分类变量的信任差异模型,模型1c为根据因子维度将受信人群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信任类型的信任差异模型。模型整体拟合结果较好,各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对不同受信人群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将13类信任指标统一放在一个模型中观察被访者对不同受信人群的信任强弱程度(模型1b),以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作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被访者对其他各类人群信任程度均要显著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表明乡村社会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比较其他各类人群相对于陌生人的回归系数,可以对乡村社会信任进行基本排序。其中对亲戚的信任程度最高,其回归系数高达4.854,与陌生人相比农民选择相信具有血缘关系的大部分亲戚。农民更愿意相信的第二类人群为邻居,相比于陌生人农民对邻居的回归系数为4.302,村庄中邻居之间交往密切,这种相互往来增强了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成为仅次于亲戚之后农民最愿意相信的人群。位于第二梯队的受信人群根据回归系数大小依次为同村同姓人士($B=3.659$)、街坊($B=3.463$)、老同学($B=3.39$)、同事($B=3.307$)和同村非同姓人士($B=3.215$),这部分人群信任程度的回归系数均在3以上,其信任程度显著高于陌生人。其中同村中的同姓人士依托宗族血缘关系获得相对较高的信任度,街坊和同村中的非同姓人士等人群由于生活在共同区域内具有一定的了解度和日常往来,老同学和同事则主要基于过往经历中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了解等获得农民的信任。第三梯队上的受信人群相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的回归系数均在2以上,按照信任程度大小依次为外地相遇的同乡($B=2.6$)、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人($B=2.363$)、一起参加文娱活动的人($B=2.341$)、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B=2.14$)和交情不深的朋友($B=2.079$)。综合所有13类人群,乡村社会的信任强度由强到弱的顺序为:亲戚>邻居>同村同姓人士>街坊>老同学>同事>同村非同姓人士>外地相遇的同乡>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人>一起参加文娱活动的人>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交情不深的朋友>陌生人。这表明乡村社会信任存在明显的“差序格局”,亲戚和交往较为密切的村庄内部人士更能获得农民的信任,而那些交往较少、族群外的人群较难获得农民的信任,这与研究假说1一致。

模型1c显示了按因子降维结果中指标所属的维度将受信人群划分为特殊信任人群和普遍信任人群两种信任类型的模型估计结果。以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特殊信任人群为参照项,农民对自己相对不熟悉和族群外的普遍信任人群持有更低的信任程度。根据回归结果,相对于特殊信任人群,普遍信任人群信任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738,显著低于特殊信任人群信任程度。这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说1,即乡村社会中的特殊信任明显高于普遍信任。

表4 乡村社会信任差序格局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1c
性别(男性)	0.166*** (0.024)	0.182*** (0.025)	0.168*** (0.025)
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健康状况	0.023** (0.012)	0.03*** (0.012)	0.023** (0.012)
文化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7*** (0.034)	-0.189*** (0.035)	-0.171*** (0.034)
高中/技校	-0.201*** (0.039)	-0.233*** (0.039)	-0.207** (0.039)
大学及以上	-0.116 (0.073)	-0.122 (0.075)	-0.119 (0.073)
婚姻状况(已婚)	0.063** (0.031)	0.06* (0.032)	0.063** (0.031)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0.213*** (0.053)	0.257*** (0.054)	0.227*** (0.053)
就业状态(农业生产)	-0.069** (0.028)	-0.081*** (0.028)	-0.07** (0.028)
家庭人口规模	0.006 (0.008)	0.007 (0.009)	0.007 (0.008)
所属经济地带(参照组: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027 (0.026)	-0.018 (0.027)	-0.019 (0.026)
东部地区	-0.099*** (0.035)	-0.103*** (0.036)	-0.096*** (0.035)
受信人群(参照组:陌生人)			
亲戚		4.854*** (0.069)	
邻居		4.302*** (0.068)	
街坊		3.463*** (0.067)	
同村同姓人士		3.659*** (0.067)	
同村非同姓人士		3.215*** (0.066)	
同事		3.307*** (0.066)	
老同学		3.39*** (0.066)	
交情不深的朋友		2.079*** (0.064)	
外地相遇的同乡		2.6*** (0.065)	
一起参加文娱活动的人		2.341*** (0.064)	
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		2.14*** (0.064)	
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人		2.363*** (0.064)	
信任类型(普遍信任)			-0.738*** (0.024)
样本数	24453	24453	24453
拟合系数	0.002	0.112	0.016

注:***代表1%水平显著,**代表5%水平显著,*代表10%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研究同时分析和验证了乡村商品化形势下社会信任对农民收入的经济效应,表5显示了对上述分析的实证结果,其中模型2a为农民收入水平的控制变量模型,模型2b为控制了农民个体和区域变量之后加入乡村社会的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子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c为在模型2b基础上引入经济地带与特殊信任因子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模型2d进一步引入了经济地带与普遍信任因子交互项,以观测市场化水平在乡村社会信任影响农民收入中的调节作用。通过逐步引入变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观测模型的稳健性和各变量的贡献率。各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结果较好,各自变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2b的估计结果显示,乡村特殊信任因子对农民收入产生反向效应,即特殊信任越强的村庄中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偏低($B=-0.093$, 5%显著)。这是因为特殊信任往往发生在亲属宗族之间,对特殊信任的群体之间往往不会产生市场化交易,而是以互助行为为主,这种方式在农业生产中或许能够产生一定的合作效应,但在市场经济和非农生产不断蔓延的乡村地区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形势。并且由于农民总是倾向于与特殊信任群体之间产生非商品化交易,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增收产生反向影响。乡村社会中的普遍信任因子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0.073$, 10%显著),农民对族群外他者的信任程度越高,收入水平相对越高。这一结论证实了研究假说2,即乡村社会中的普遍信任能够降低农民与他者的交易成本,促成市场交易的达成,最终作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将代表乡村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地带指标与乡村社会信任因子分别构建交互项加入模型以考察乡村市场化在社会信任的收入效应方面起到的作用。模型2c的回归结果,乡村特殊信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未随着所属经济地带发生显著变化,即可以认为特殊信任与农民收入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不因乡村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模型2d的估计结果显示,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相比,乡村普遍信任在东部地区的收入效应更加明显($B=0.486$, 1%显著),中部地区的乡村普遍信任并未比西部表现出明显的农民收入效应。其原因在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农民收入主要依靠非农生产,应对的市场交易更加频繁,在不完全契约的市场环境下,乡村社会中的普遍信任更能够发挥积极效应,促成农民与特殊信任群体外他者的市场交易。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相差不大,乡村普遍信任未能体现出比西部地区更加明显的农民收入效应。

表5 乡村社会信任对农民收入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2a	模型2b	模型2c	模型2d
性别(男性)	0.864*** (0.093)	0.873*** (0.093)	0.867*** (0.093)	0.864*** (0.093)
年龄	-0.021*** (0.004)	-0.021*** (0.004)	-0.021*** (0.004)	-0.021*** (0.004)
健康状况	0.156*** (0.043)	0.157*** (0.043)	0.155*** (0.043)	0.148*** (0.043)
文化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2 (0.128)	0.002 (0.129)	0.001 (0.128)	0.02 (0.128)
高中/技校	0.514*** (0.145)	0.49*** (0.146)	0.488*** (0.146)	0.485*** (0.145)
大学及以上	0.104 (0.281)	0.074 (0.281)	0.069 (0.281)	0.057 (0.28)
婚姻状况(已婚)	0.722*** (0.118)	0.734*** (0.118)	0.735*** (0.118)	0.728*** (0.118)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0.306 (0.198)	0.304 (0.198)	0.31 (0.199)	0.295 (0.198)
就业状态(农业生产)	-0.653*** (0.105)	-0.657*** (0.105)	-0.656*** (0.105)	-0.676*** (0.105)
家庭人口规模	-0.015 (0.033)	-0.011 (0.033)	-0.011 (0.033)	-0.009 (0.032)

表5 乡村社会信任对农民收入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续)

变量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模型 2d
所属经济地带(参照组: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248** (0.099)	0.28*** (0.1)	0.277*** (0.1)	0.263*** (0.102)
东部地区	0.733*** (0.133)	0.739*** (0.133)	0.733*** (0.133)	0.702*** (0.133)
特殊信任因子		-0.093** (0.044)	-0.103 (0.073)	-0.103 (0.073)
普遍信任因子		0.073* (0.045)	0.074* (0.045)	-0.078 (0.072)
中部地区×特殊信任			0.059 (0.098)	0.061 (0.098)
东部地区×特殊信任			-0.088 (0.125)	-0.099 (0.124)
中部地区×普遍信任				0.149 (0.098)
东部地区×普遍信任				0.486*** (0.127)
截距项	0.896*** (0.338)	0.89*** (0.337)	0.905*** (0.337)	0.964*** (0.336)
样本数	1778	1778	1778	1778
拟合系数	0.232	0.235	0.236	0.242

五、结论与讨论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被赋予诸多关注,本研究以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乡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和信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经济效应两个核心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研究采用多重等级评量方法构建了更加准确客观的社会信任测量指标和统计检验方法,通过数据转换的方式构建了受信人群和信任程度的有序 Logit 模型,实现了农民对不同人群信任程度的差异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与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一样,乡村社会中农民的人际信任也存在明显的“差序格局”,即存在“差序信任”。农民对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的信任程度最高,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最低。农民对亲戚、邻居等社群内部群体的特殊信任程度明显高于社群外部人员,说明当前乡村的社会信任依然主要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相对缺乏。在分析乡村信任的收入效应时,发现乡村社会中的普遍信任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发现证实了信任对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且这种促进作用需要依托乡村的市场化发展。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正确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乡村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是乡村社会治理中需要同时兼顾并且相互依存的两项重点工作,经济发展是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秩序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其次,重视对农民社会资本与乡村新兴社会秩序的培育与建构。随着乡村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中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和社会秩序逐渐不再适用于经济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对外交流等方式积极培养和建构农民与亲属及社群之外其他群体之间的普遍信任,以此帮助农民积累社会资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增长。最后,根据市场化程度对不同地区乡村的社会治理与农民增收展开不同的应对策略。

随着乡村的市场化发展,乡村社群的社会边界逐渐模糊,农民与社群之外其他群体的交流明显增加,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覆盖亲戚和邻里以外的其他个体,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会呈现出新的矛盾与张力,乡村的社会信任必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农民对同事和老同学等群体的较高信任度也反映出相较于传统乡土社会中严格依托血缘宗族关系的信任而言,某些新的社会信任正在建构和形成中。随着

农民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加,新建构的信任将会逐步改变乡村的社会信任格局,对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格局变化的追踪考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个值得说明的问题是,既然信任是可以建构和积累的,农民与群体之外他者之间的交易活动也可能进一步建构出新的社会信任,这种由于重复交易而生成的信任构成市场经济形势下乡村的新型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累积和增长,即信任与农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通过寻找地方的特定历史事件变量作为工具变量^[22-23],或者将信任界定为从祖先继承来的继承信任^[24]等方式予以解决。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本文尚未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以控制乡村社会信任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这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由于重复交易产生的信任资本将进一步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对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促进效应,未来的研究也会在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信任的建构方面展开更多分析与探讨。

参考文献:

- [1] 乐章,涂丽.乡村发展、乡村秩序与乡村社会变迁——基于十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15,(4):96-101.
- [2] 曾红萍.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与社区社会资本变迁[J].中国农村观察,2016,(4):23-31.
- [3] Hardin R. Conce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rust[M].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3-40.
- [4] 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 [5] 邹宇春,敖丹,李建栋.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2,(5):131-148.
- [6]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 [7]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M].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8]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 [9] 黄家亮.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1-92.
- [10] Arrow K. Gifts and Exchange[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72,1(4):343-362.
- [11] 唐为,陆云航.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关系网络、信任与和谐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1,(9):77-85.
- [12] Dincer O, Uslander E. Trust and Growth[J]. Public Choice,2010,142(1):59-67.
- [13] Algan Y, Cahuc P. Trust, Growth, and Well-Being: 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14,(2):49-120.
- [14] 齐春宇,孙力军,李修彪.信任与经济增长:1949-2014——基于1934年中国21省民间借贷利率测度信任[J].现代经济探讨,2018,(5):6-13.
- [15] 吕朝凤,陈汉鹏,Santos López-Leyva.社会信任、不完全契约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9,(3):4-20.
- [16]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17]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38-52.
- [18] Hart O, Moore J.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6):1119-1158.
- [19]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 [20] Luo J.D, Yeh K. The Transition Cost-Embeddedness Approach to Study Chinese Subcontracting[M]. In Ray-May Hsung, Nan Lin and Ronald Breiger (ed.), 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in Communitie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5-138.
- [21] 张荳芸,谭康荣.制度信任的趋势与结构:“多重等级评量”的分析策略[J].台湾社会学刊,2005,(35):75-126.
- [22] Guiso L,Sapienza P, Zingales L. Long Term Persistence[R].Working Paper 1427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8.
- [23] Tabellini 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8(4):677-716.
- [24] Ljunge M. Inherited Trust and Economic Success of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s[R]. IFN Working Paper, 2012.

(责任编辑:彭晶晶)